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元代科举制的历程。总的来说，据作者的研究，元朝科举所遇到的最大的阻碍因素，还是来自于蒙古人的文化旧俗。于是每当恢复科举制度的机会产生或出现之时，蒙古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所做出的总是不利于科举的选择。这也部分的反映出，或许相较于契丹和金人，蒙古人的汉化程度还要来得更低一些。而就元代早期科举制度的长期停废，作者列举了四项互相联系、共同作用的原因：一，元朝开国时官员来源充足；二，科举在长期推行过程中，流弊日积；三，忽必烈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的冲突；四，由吏入仕逐渐制度化。其中第四个因素的影响一直贯穿着元朝的始终。

作者上述的分析笔者以为都大体不错，但作者最后对元朝科举制度的作用和影响的看法则颇有可商榷之处。既然科举在元朝入仕之途中作用不大，又居于绝对的劣势，则无论其是否将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，又能够真正发挥多大的作用呢？同时，作者描绘的科举制度，在元朝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占据的地位几乎可用微不足道来形容，又怎么能够对理学起到“相当的促进作用”？不能不说，作者的论证与结论之间，存在着本文所无法跨越的逻辑鸿沟。而且由于元朝统治版图的扩大，科举制度影响的范围或许比前代要大，但显然不及前代的深度。

作者在谈及忽必烈对于科举的态度时，对许衡的论述颇可值得玩味，正是这一元代最有影响力的理学家，本人对于科举问题十分暧昧，表现出冷淡而非热忱。这或许也可部分地反映元代理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。